



任弼时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在其革命生涯中始终注重群众工作、强调群众观念。延安时期，为了在整风学习中改造党员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使党和群众的联系更加密切，任弼时写了《共产党员应当善于向群众学习》一文。在文中他用三个“为什么”强调了共产党员要向群众学习的原因以及如何向群众学习等问题。

“为什么说向群众学习，是有关党的领导是否正确，是否不脱离群众的问题呢？”

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工作路线。任弼时强调党的政策唯有得到群众拥护才能动员群众去执行。他认为向群众学习之所以关乎党的正确领导，是因为党制定的政策必须符合群众利益与群众要求，唯有如此才能够得到群众的拥护、动员群众积极行动。然而，要想把党的政策有效转化为群众的自觉行动，干部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必须做到面向群众、关心群众生活、倾听群众呼声以及深入了解群众的迫切需要。任弼时把这个过程中的“群众方法论”总结为：凡属正确的领导意见，必须是从群众中集中起来的、在群众中坚持下去的意见。这是因为党员干部只有先向群众学习，向具体事件学习，才能有力地指导群众行动。

任弼时针对当时党内存在的脱离群众的倾向，号召党员做到毛泽东强调的“一定要有眼睛向下的决心和甘当小学生的精神”，并要求每个党员，特别是党员干部学习1943年中共

中央通过的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任弼时认为群众有着伟大的创造力，只要依靠群众，任何困难都有办法可以解决。他在文章中为脱离群众的干部画像：“有些同志所拟的计划或决定，不是经过详细的调查研究，不是从总结群众实践斗争的经验产生的，常常是只凭主观，只凭感想，只凭书本去决定政策，自然要成为不切实际的空论。他们在执行上级一般的决定时，常常不善于根据当地情况去研究具体实现的办法，而是简单地用强迫命令的官僚主义办法去完成。在执行过程中发生困难时，又常常是眼睛向上，等待办法从上面降临，自己完全失掉主动性和创造性。”任弼时认为解决上述问题的办法就是党员干部要虚心向群众学习。

“为什么说向群众学习，是有关理论与实践能否密切联系，马列主义能否具体化与发展的的问题呢？”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党的优良作风。针对当时党内存在的理论与实践不统一的情况，任弼时强调，有些同志在讲哲学时，只是抽象地懂得理论由实践产生再回去指导实践，而一到实际工作中常常不能正确地使这两者统一起来。他在文中指出，这种情况的出现是因为有人以为理论无法指导实践，如认为《资本论》不能解释边币、法币问题；还有人以为在春耕运动、发展合作社等实际工作中没有理论可言，也学不到理论。任弼时批判了上述两种错误认识，并指出学习

《资本论》、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目的，就是为了从这些学习中能够得到方法以帮助我们解决实际问题；在春耕运动、发展合作社等实践中要总结经验，找到规律，形成明确的方向。一句话，“我们天天要领导群众行动，就天天需要理论来指导”。

在任弼时看来，唯有从群众中来的理论才能指导实践。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凭空想出的，是从群众中来的，是把群众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把群众盲目的实践，变成自觉的有目的的行动。任弼时认为只有通过向群众学习使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才能真正使马克思主义成为行动指南而不是教条，真正使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真正使马列主义具体化、中国化，并有新的发展。因此，任弼时强调我们要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不仅要学习马列原著，还特别要去学习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学习毛泽东的著作及党的决定，并要在领导群众实践中发展马列主义。

“为什么说向群众学习，是有关我们有无群众观念及党性纯否的问题呢？”

中国共产党人的党性与人民性始终是统一的。之所以说向群众学习关乎党性，任弼时认为其原因是我们的革命不是为了个人的利益、个人的名誉地位，而是为了群众谋解放。所以在一切工作中“都要从照顾群众的利益出发，从照顾群众的经验出发，从依靠群众的力量出发”。他指出党密切联系群众就要“与群众融成一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讲好中国故事，解读中国实践，展示中国风采，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重大责任和光荣使命。孙来斌教授新著《中国制度守正创新之道》，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用精准的事实、简练的文字、清晰的结构，呈现了中国制度的生动故事和丰富内涵。

勇于担负讲好中国制度故事的时代使命。近年来，“中国奇迹”“中国震撼”催生国内外理论界“读懂”中国经济、“破译”中国制度的热潮。世界高度关注中国本是一件好事，但有时免不了受种种因素的影响而导致演绎“失真”。如何讲述中国好故事，传播中国好声音，是我国理论工作者的当务之急。该书以讲好中国制度的故事为己任，字里行间流露出作者浓浓的爱国情怀与学术担当。该书从改革开放行稳致远的历程中，破译了中国奇迹的制度密码；从永葆生机活力的故事中，揭示了中国制度的守正创新之道；从历史、理论与现实的结合中，开显了中国之治的显著优势。

着力探讨讲好中国制度故事的表达方式。如何讲好中国制度的故事，是一门大学问，既要有道，也要有术。把制度的故事写成通俗理论读物，必须要选择恰当的话语方式。面向大众讲述中国制度的故事，是阳春白雪还是下里巴人？是“端起架子”还是“放下身段”？翻阅此书不难发现，它语言畅达、内容翔实、说理透辟，生动诠释了讲好中国制度故事的有效方式。有时候，天边不如身边，道理不如故事。中国制度生长在古老的东方国度，它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演绎着一个又一个动人的传奇。作者用通俗生动的语言，阐述了中国制度的精彩篇章。同时，该书注重各部分论述的环环相扣、层层递进，体现了严密的逻辑性。

着力提高讲好中国制度故事的传播效果。该书不仅能够引领读者阅读中国制度的生动故事，而且还能引导其收获故事背后蕴含的深刻理论。该书作者从中国制度的生长逻辑、基本内涵、显著优势、重大价值等方面，深入浅出地分析阐释了中国制度守正创新的理论底蕴、实践展开、时代要求等问题。该书以通俗的话语讲述了中国制度造福

讲述中国制度故事的理论佳作

□ 陈曙光



人民的故事、中国制度保障中华民族奋斗圆梦的故事，着力提高讲好中国制度故事的传播效果，积极助力广大干部群众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自信。



“其学必始于观书”——苏轼的治学之道

□ 赵纪萍

苏轼（1037—1101年），字子瞻，号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是中国文化史上罕见的通才、全才。无论诗词文赋，还是书法绘画，苏轼都造诣极高。他一生留下200多万字著述，其中包括2700多首诗，300多首词，还包括一大批散文和书画作品。他的成就与他勤于读书、善于读书有很大关系，他强调“其学必始于观书”，积累了丰富的治学思想。他所倡导的“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的治学理念，对于今天读书治学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

有感于当时士大夫中滋长的急功近利和浅薄轻率的风气，苏轼在《稼说送张琥》中巧用庄稼要等到成熟才能收割的道理来阐述治学之道，“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即在博览群书时要汲取书中的要领和精髓，从大量的知识或材料积累中提炼出精华部分再著书立说。

所谓“厚积”“博观”，是指广博地获取知识，丰厚地积累学养。所谓“约取”，就是慎取、精取，是在博观的基础上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所谓“薄发”，是在“厚积”的基础上，进行严谨阐释。“薄”不是单薄，而是凝练、精要、准确、深刻，做到“发”则中的，“发”则中肯。苏轼认为，要想做到从容“约取”与“薄发”，必须做到“博观”与“厚积”为基础。在《与张嘉父七首》其七中，苏轼以富人之筑大第须储材充足为喻，对“博观而约取”进行详细阐释，指出只有广博地积累学养，才能著成“不容有所悔”的“一家之言”。

苏轼一生都在践行“博观而约

取，厚积而薄发”的治学理念。如他强调读书乃治学之根本，“自孔子圣人，其学必始于观书”；强调“读书万卷始通神”，“某闲废无所用心，专治经书。一二年间，欲了却《论语》、《书》、《易》。舍弟亦了却《春秋》、《诗》”。在此思想指导下，他广泛涉猎诸子百家、经史子集，在20岁的时候就已经博通经史，积累了相当深厚的学养，“比冠，博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这使他在治学方面取得了极高的造诣，写出了《东坡易传》《东坡书传》《论语说》，对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出了巨大贡献。

“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

苏轼主张在治学过程中要熟读深思，对事理或学习对象进行研究式学习，即“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他一生治学遵循此法，具体做法可以概括为三点，即“一生日课”“一书数过”以及“一意求之”。

“一生日课”是指每日必定完成抄书这项必修课，以每天抄书为读书治学筑根基。宋人陈鹄讲过苏轼抄《汉书》时采用不同的方式，连抄三遍，直至全部背诵，无一字差错。作者由此感叹道：“东坡尚如此，中人之性，岂可不勤读书邪！”苏轼直到晚年，仍乐于此法，用以教子。跟随苏轼贬谪儋州的苏过以父为师，将一部《唐书》抄完，而且接着又抄《汉书》。苏轼视之为“穷儿暴富”，认为儿子通过抄书必将迅速地增长学识、深厚地积淀学养。

“一书数过”是指读书要坚持反复阅读和揣摩，不能浅尝辄止。在治学实践中，苏轼也是这样做的。《汉书》他就读过很多遍，而且乐于将这种方法与人分享，“但卑意欲少年为学者，每一书皆作数过尽之”，“吾读《汉书》，盖数过而始尽之。如治道、

人物、地理、官制、兵法、货财之类，每一过专求一事，不待数过，而事事精核矣”。苏轼对于《周易》也是反复研读，长期认真反复咀嚼，最终写就《东坡易传》。他还向一位朋友提到自己研读《周易》的情形，“借示《易解》，略读数篇，已深叹服……此书常患不能尽通，得此全编，为赐甚重，且乞暂借，反复详味，庶几有所自入”。

“一意求之”是指治学要有针对性，读书贵在专与精。苏轼认为，治学时要针对一个主题作研究性阅读，学懂弄通之后再换另一个主题进行研读，这样读书可以做到既博又精，是夯实治学基本功的重要方法。苏轼曾在给王穉的信中分享了这一方法，“书富如入海，百货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兼收尽取，但得其所欲求者耳。故愿学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今兴亡治乱、圣贤作用，但作此意求之，勿生余念。又别作一次，求事迹故实典章文物之类，亦如之”。这种治学理念目的明确，效果显著，能从各方面吸收营养，对后世影响很大。

“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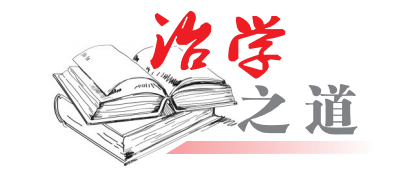
苏轼治学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表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苏辙对他曾有“（苏轼）少与辙皆师先君。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的追述。苏轼服膺儒家经世济民的治学理想，认为“古之为学者四，其大者则取士论政，而其小者则弦诵也。……有学而不取士、不论政，犹无学也”，强调要把治学和社会现实联系起来，以著书立说为武器针砭时弊、奉献社稷，主张治学要有益于世，反对脱离实际的空谈。苏轼的诗文著述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特点。他的诗词中有对民间疾苦的同情，有对新政流弊的针砭，有对国



家安危的关注，还有自己深切的爱国热忱。如苏轼初任凤翔府判官，为改衙前弊政，给宰相韩琦写《凤翔到任谢执政启》，后又作《凤鸣驿记》，建议改善官驿住宿问题。《吴中田妇叹》则如实反映了新政的流弊，表达了对农民的同情和对新政的不满。

苏轼留有大量的政论和史论，大都“以体用为本”，反映现实，切中时弊，反映出他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在《省试刑赏忠厚之至论》中提出：“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之道”，把“仁政”作为施政理想；在《奏为法外刺配罪人待罪状》中表达了自己对变法的看法，主张变法要循序渐进，不能操之过急、急功近利；《策略》阐释天下形势、政策弊端并提出方针政策；《策别》从课百官、安万民、厚财货、训军旅四方面提出具体措施；《策断》提出安边御敌之策，其中见解非常有价值。

另外，苏轼本人最为看重的三部学术著作《东坡易传》《东坡书传》《论语说》更是他抱着传承圣人大道的目的而写就。苏轼贬谪黄州后，承其父苏洵之说，撰成《东坡易传》九卷、《论语说》五卷，并开始撰写《东坡书传》。后来除对前二书不断进行修订之外，又撰成《东坡书传》二十卷。苏轼曾说明自己写三部学术著作的初衷：圣人所传之道早已被一些俗子们肢解得支离破碎，自己若不把圣人之道揭示出来，后人就更难识别道之大全和真伪了。苏轼对于这三部著作十分自信，“虽拙学，然自谓颇正古今之误，粗有益于世，瞑目无憾”，认为这三部著作能够担负起传承文化命脉的重任。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0年第3期目录

本刊专稿	
党的政治建设的精神内核与实践进路	刘红凛
专题·公共卫生与社会保障	
全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与国际合作	赵磊
重大突发事件中国困难群体兜底保障体系建设思路	关信平
重大疫情防控与我国医疗保障体系的完善	申曙光 朱艺唯
社会保障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功能研究	鲁全
马克思主义	
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革命、建设、改革的关系	宣秦睿
资本主义分裂的多重面相	
——基于马克思经济哲学的视角	陈飞
论马克思的社会理论建构与当代价值	姜凯宜 蓝江
党的建设	
中国共产党党内治理的动因、困境与方略	张书林
中国共产党早期党校政策的形成及运作（1921—1927）	张仰亮
政治学与公共管理	
基层公务员职业倦怠问题新探索	
——基于心理定力视角的实证研究	陈新明 萧鸣政
以数据民主破解消极腐败	程同顺 史猛
社会学	
特大城市居民相对贫困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基于北京、上海、广州的研究	张文宏 苏迪
空间资源再定价与重构新型集体经济	杨帅 罗士轩 温铁军
法学	
论我国一般法律监督 and 特殊法律监督的关系	蒋德海
“放管服”改革背景下行政检查监管目标实现研究	曹臻
风险社会的立法治理：《传染病防治法》的修改思路	李少文